

引文格式: 年猛, 李敏行. “去工业化”的类型、成因与中国应对 [J]. 常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5 (3): 50-56.

“去工业化”的类型、成因与中国应对

年猛, 李敏行

摘 要: 当前, 中国正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向高质量工业化后期艰难转型阶段, 但已经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现象, 引发广大学者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和政治安全是否会受其负面影响的担忧。在界定“去工业化”类型及其影响的基础上, 提出制造业是创新之源、强国之基、国民经济健康的压舱石, 不可盲目追求产业结构服务化, 应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生产成本、优化空间布局、与先进服务业融合发展等举措促进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关键词: 典型去工业化; 过早去工业化; 再工业化

作者简介: 年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李敏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F40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4.03.006

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 发达国家服务业快速发展, 超越工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此, 一些学者认为服务化不仅是产业结构演进的高级形态, 而且是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1]。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 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制造业竞争优势仍是大国竞争的根基^[2], 并重新审视“去工业化”道路, 纷纷号召制造业回归, 如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计划”、德国提出“工业 4.0”战略等。

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增加值从 2000 年 3850 亿美元增加至 2022 年 4.98 万亿美元, 占全球制造业总量的比重由 6.5% 提高到 29.5%。制造业是欠发达经济体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自动扶梯^[3]。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向高质量工业化后期艰难转型阶段, 但制造业的实际占比、全要素生产率却出现同步下降趋势^[2], 引发学界对于中国是否出现“去工业化”现象的广泛讨论。一个显著的事实是, 当前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呈下降趋势。从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 (如图 1) 来看,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自 2007 年开始下降, 尤其是 2012 年以来下降迅速, 2015 年降至 30% 以下。从就业结构变化趋势 (如图 2) 来看, 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在 2012 年达到高位 30.3% 后开始下降。无论是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变化趋势看, 中国已经显示了“去工业化”特征。

对于中国是否存在过早“去工业化”倾向的问题, 张斌等^[4]认为, 在中国“去工业化”历程中社会结构变化与发达经济体历史轨迹相吻合, 并非过早“去工业化”。赵伟^[5]认为, 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服务业化顺应了产业结构变化规律, 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结果, 无须过度关注制造业比重指标。闫冰倩等^[6]则通过区分纳入服务业中间投入的“修正的制造业增加值/GDP”重新检验中国产业结构变迁, 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去工业化”的“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之间, 并非“过早去工业化”。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 魏后凯等^[7]认为, 中国工业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 此背景下的“去工业化”呈现了全面、过早、快速的特征。黄群慧等^[8]认为, 中国西部地区大多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去工业化”现象使其“未强先降”。蔡昉^[9]分析指出, 中国在制造业比重下降时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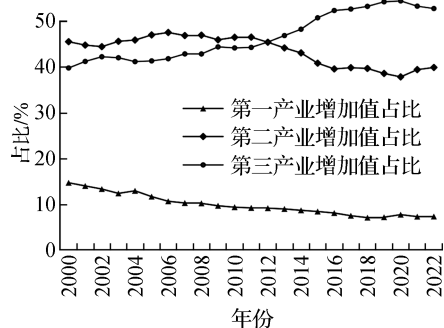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22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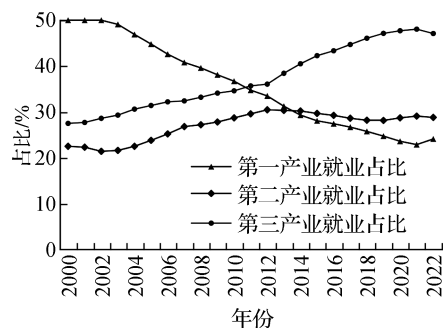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22年就业结构

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因而其去工业化具有“早熟”性质。1955年美国人均GDP为10896美元、1970年日本人均GDP为9713美元时制造业占比开始下降，而中国在2007年人均GDP仅为6303美元时就已经出现制造业占比下降的趋势。“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引发广大学者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和政治安全是否会受其负面影响的担忧^[10]。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去工业化”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去工业化”及其类型、影响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空间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角度对“去工业化”现象进行阐述和界定。从空间视角来看，“去工业化”最直接和最明显的地理性表征是制造业空间位置转移。如，制造业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直接引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去工业化”进程。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去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就业或产值占比下降。其中，制造业就业占比是常用的界定指标。Saegeer^[11]提出，“去工业化”是制造业相对就业和绝对就业均大幅萎缩的一种经济现象。Rowthorn等^[12]将“去工业化”定义为制造业在国民就业中所占份额的长期下降。Tregenna^[13]指出，将“去工业化”理解为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忽视了制造业产出在总产出中所占份额的变化趋势。假设存在两个制造业就业份额均出现大幅下降的国家，其中一国制造业产出比重不变，而另一国制造业产出比重大幅下滑，仅用就业份额作为判断标准，两国“去工业化”程度相同，但其本质上却具有明显差异。因此，笔者主张用制造业就业占比和产出占比共同持续下降作为“去工业化”的判断标准。除此之外，Ranis^[14]用贸易份额来定义“去工业化”，提出“去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贸易占世界贸易相对份额出现持续下降的一种状态。但Cowie等^[15]认为，仅从指标变化的角度来界定“去工业化”过于局限，需要对“去工业化”的内涵做出进一步的解释，由此提出“去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转型过程，不仅体现在就业及产出的变化，还包括了与工业化相关的社会结构等的变化。王展祥等^[16]赞同此观点，认为“去工业化”还应包括贸易结构、投资结构、城市化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转型。

从世界各国“去工业化”历程来看，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去工业化”进程之后实现了产业结构向“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的有效升级，但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南非等在经历了“去工业化”进程之后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学界大致将“去工业化”分为“典型去工业化”和“过早去工业化”两种类型。“典型去工业化”（亦称“积极地去工业化”）是指，在工业化后期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正常经济现象，是高度发达且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体经济持续增长的正常结果，制造业就业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增长^[17]。此时，制造业就业和产出下降会被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就业和产出增加所弥补，传统制造业也被高端制造业替代。“典型去工业化”是制造业生产率大幅提高引起资源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

升级的过程^[18]。“过早去工业化”(亦称“消极地去工业化”“早熟去工业化”)是指,在没有全面实现工业化之前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制造业产值和就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就开始持续下降的过程。1990年以后进入“去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国民收入水平仅为1990年前“去工业化”国家的40%^[19]。与高收入国家“去工业化”相比,低收入国家制造业就业占比与实际人均收入之间所呈现的“倒U型”曲线,其拐点对应的实际人均收入水平更低,且曲线更陡峭,变化更剧烈^[20]。尽管都表现为制造业就业占比和产值份额持续下降、产业结构服务化,但“典型去工业化”被认为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结果;而“过早去工业化”则被认为是工业化失败的产物,此时制造业部门流失的劳动力不会被吸收进服务业部门,失业率会上升,是一种不健康的经济表现。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依托,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对于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结构转换、推动经济长期增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去工业化”的影响进行分析。针对发达国家“典型去工业化”现象,研究者大多较为乐观。“典型去工业化”不仅不会导致失业问题^[17]、福利损失^[21]、经济增长延缓,还有助于资源再分配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22]。但也有一些研究与上述乐观看法不同,随着制造业向他国转移,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就业岗位也会随之转移^[23]。在技术进步内生条件下,发达国家的“典型去工业化”也会降低国内福利水平^[24],而且收入水平越低的阶层的福利损失更大,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问题^[24]。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去工业化”,即便是发达国家的“典型去工业化”,都会破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25]。“去工业化”对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推动作用甚微,不足以弥补“去工业化”导致的经济整体衰退^[26]。针对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学者们大多持消极的观点。“过早去工业化”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等^[27]。“过早去工业化”造成制造业萎缩和经济增长停滞^[28],是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29]。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贫困人口增加,贫富差距加大^[30]。而“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经济增长低迷的内在机制在于,经济发展陷入“制造业萎缩—增长动力不足—低投资水平—低生产率—高失业率”恶性累积循环陷阱而无法自拔^[31]。

二、“去工业化”的成因

第一,需求变化。克拉克扩展了恩格尔定律,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制成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低于服务业,用于购买工业制成品的收入占比会先上升,在达到一个阈值后开始下降,制造业就业以及产值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占比最终呈下降趋势^[32]。消费者需求模式变化最终将促进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33]。制造业和服务业需求结构变化、相对价格变化、相对生产率变化可以解释1963—1994年近2/3的经合组织国家“去工业化”原因^[34]。

第二,部门生产率差异。从宏观层面来看,若一个部门的生产率持续增长并超过其他部门,且部门之间的需求模式保持不变,生产率持续增长部门的就业会收缩,而生产率相对稳定的其他部门的就业会扩大^[35]。Almon等^[36]的研究证实,制造业就业和产出份额下降是由部门间生产率差异导致相对价格变化的结果。

第三,生产成本增加。在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刚性的情况下,经济持续增长、新兴产业发展会引发生产要素价格普遍上涨,从而提升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导致生产企业转移至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从而产生“去工业化”现象^[37]。

第四,国际贸易引致比较优势变化。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常常因劳动力价格低、环境污染成本低、资本回报率高以及国家工业化战略支持等优势,在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领域

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南北贸易、全球化常常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原因^[32]。根据Kollmeyer^[38]的估计,全球贸易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贡献略高于20%。Autor等^[39]估计,来自中国的竞争可以解释1990—2007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总量下降四分之一的原因。

第五,资源禀赋变化。自然资源禀赋变化可能会引起“荷兰病式去工业化”。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专注于出口工业制成品,制造业就业人数较多,当发生如发现石油等外生冲击时,自然资源禀赋变化可能会引起比较优势变化,使得出口产品从制成品转向资源密集型产品,导致制造业部门就业和产出萎缩^[11]。Ploeg^[40]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丰富会导致“去工业化”并促使劳动力从非贸易部门和贸易部门向资源部门流动。

第六,政府政策决策影响。美国“去工业化”不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是一场可以追溯到政策选择的人为危机,是美国政府实施的低关税政策、强势美元政策、鼓励进行海外投资的财政政策引发的^[2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去工业化”进程并非市场机制自我演进的结果,而是政府政策支持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过度金融化的结果^[41]。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同样受到政府决策的重要影响^[42]。

第七,统计错觉。随着产业内分工逐步细化,那些制造行业内的服务业务(如设计、运输等)被分离出来形成新的服务业,但制造业统计数据未必就能将之包含在内,这种情况并非制造业萎缩,而是统计意义上的假象^[43]。由于统计方法存在差异,中国制造业产值统计受法人注册的公司属性影响;而在英美等国家,当制造业企业的服务雇员超过制造雇员时,企业就会被纳入服务业进行统计。黄群慧等^[8]研究认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对被高估;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相对被低估,造成制造业衰退且重要性降低的“错觉”。

此外,投资结构变化^[34]、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44]、丧失劳动成本优势之前尚未形成技术优势^[45]等都会造成“去工业化”现象。

三、启示与中国应对

(一) 启示: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

尽管学者们对“典型去工业化”造成的影响的认识存在分歧,但普遍认为“过早去工业化”负面影响较大。从发达国家普遍提出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再回归”等战略来看,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制造业对稳定国家宏观经济、提高创新水平等的重要地位和基础性地位,这对正处于由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关键期的中国制造业发展以及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强化“制造业必须筑牢”的基本认识。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我常说两个必保,一个是粮食饭碗中国必须端牢,再一个制造业必须筑牢。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靠自己解决这两个问题,不能‘一招鲜吃遍天’,缺了哪一项国际市场都保不了我们。”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首先,制造业是创新之源。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和技术进步的主要产业载体。从当前发达国家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来看,制造业都占据主导地位。麻省理工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近20年来,美国“去工业化”进程已经对其本土的创新能力和技术造成了严重损害。其次,制造业是强国之基。具有雄厚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是一个强国的最根本标志。制造业本身就兼具促进经济增长与军事实力增强的基本属性。发达国家即便是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去工业化”进程,但其工业领域中的军工业地位依旧强势和牢靠。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保障国家的基本安全,必须以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最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健康的压舱石。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发达国

家充分认识到“去工业化”、经济过度“金融化”与“服务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历史经验也表明,不仅制造业是经济增长与居民就业的保障,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也是国家经济平稳、健康的压舱石。因此,要高度警惕“去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结构“空心化”,要坚持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不可盲目追求产业结构服务化。长期以来,产业结构服务化,即制造业企业实现由产品生产者向服务供应者转型、价值链由以制造业为中心向以服务业为中心转变、服务业超过工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等,被广泛认为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形态,也是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表明,在未能完全实现工业化进程、工业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通过政策手段干预盲目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形式上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实质上是一种“虚高级化”,会制约本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尽管“典型去工业化”进程最终演化成为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资源要素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行业可能会对技术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因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还是发达国家的“典型去工业化”,制造业空心化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不可盲目追求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特征。

(二) 中国应对: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制造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将做优做强实体经济、抓好制造业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选择,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第一,在巩固第一制造大国基础上,加快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虽然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宽而不深”,遭到社会各界诟病;但也应该认识到,没有量的积累很难实现质的提升,不能轻易抛弃简单加工制造环节,避免在未实现制造强国的前提下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因此,要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应在持续巩固第一制造大国的基础上,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作为基本方向,以“固优势、补短板”为基本原则,实现“制造”向“创造”转变,全面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同步推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与生产成本降低,全方位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从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战略角度来说,中国制造业既要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又要加快实现“制造强国”,而制造成本上升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对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构成双重约束。长期以来,由于发展基础薄弱等原因,中国制造业发展走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仿创新道路,但随着中国制造业发展逐步迈向全球技术前沿领域,原先的道路已经无法走通,必须聚合社会各界力量,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制造业前沿技术,加强基础领域与关键核心技术的持续攻关,促进“政、产、学、研”充分融合,以加快提高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此外,当前要素禀赋萎缩引致的“去工业化”特征日趋明显,在制造业尚未得以全面发展,面临增长瓶颈的背景下,保持制造业“世界工厂”地位要维持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稳定,在巩固减税降费成果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制造业直接成本、流通成本以及交易成本,进一步保持和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第三,优化制造业区域空间布局。尽管中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从空间层面来看,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制造业布局不均衡现象突出。东部地区工业化程度较高,对于劳动、土地等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来说,生产成本逐渐升高,国际竞争力逐渐下降;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正进入初中期,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制造业区域空间布局,促进东部地区传统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有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巩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而且为东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发展空间。但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

中也需注意,不能再走过去高污染、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老路,中西部地区政府要建立适当的环境准入机制,从源头上治理环境问题。着力推进创新驱动、智慧高效的高质量新型工业化,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促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要摒弃单纯以提高第三产业占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观念,强大的实体经济和高端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根基,当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内部结构失衡问题,且呈现一定程度的低端化趋势,要通过制造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此外,尽管产业结构服务化并不等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去工业化”进程对国家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但不能因此限制服务业发展。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不仅有助于重塑传统制造业竞争优势,而且有助于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速度,使其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最终实现制造业全面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 [1] 江小涓,李辉. 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 [J]. 经济研究, 2004, 39 (1): 4-15.
- [2] 黄群慧,黄阳华,贺俊,等. 面向中上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工业化战略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12): 94-116.
- [3] RODRIK 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J]. Challenge, 2014, 57 (3): 5-39.
- [4] 张斌,邹静娴.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展与差距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8 (6): 9-24.
- [5] 赵伟.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不宜设定制造业占比指标 [J]. 探索与争鸣, 2021 (1): 60-68.
- [6] 闫冰倩,冯明. 服务业结构性扩张与去工业化问题再审视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38 (4): 42-62.
- [7] 魏后凯,王颂吉. 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 (1): 5-22.
- [8] 黄群慧,杨虎涛. 中国制造业比重“内外差”现象及其“去工业化”涵义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3): 20-37.
- [9] 蔡昉. 生产率、新动能与制造业:中国经济如何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5): 5-18.
- [10] 年猛,刘峰. 如何看待制造业服务化 [J]. 开放导报, 2014 (5): 67-70.
- [11] SAEGER S S. Globalization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myth and reality in the OECD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97, 133 (4): 579-608.
- [12] ROWTHORN R, COUTTS K. De-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in advanced economies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28 (5): 767-790.
- [13] TREGENNA F. Characterising deindustrialisation: 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nd output internationally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33 (3): 433-466.
- [14] RANIS 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osed by Asia's superexporters: implications for manufactured exports from Latin America [M] //Latin America's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a-Champaig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167-190.
- [15] COWIE J, HEATHCOTT J. The meaning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J]. Canadian journal of urban research, 2003, (1): 310-311.
- [16] 王展祥,王秋石,李国民. 去工业化的动因与影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1 (1): 18-23.
- [17] ROWTHORN B, WELLS J R.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eign trade [M].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56-63.
- [18] 黄永春,郑江淮,杨以文,等. 中国“去工业化”与美国“再工业化”冲突之谜解析:来自服务业与制造业交互外部性的分析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 (3): 7-19.
- [19] RODRIK D.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6, 21 (1): 1-33.
- [20] YAZGAN S, MARANGOZ C, BULUT E. The turning point of regional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S: evidence from panel and time-series data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22, 61: 294-304.
- [21] SPILIMBERGO A.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trade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6 (3): 450-460.
- [22] ROWTHORN R E, RAMASWAMY R. Deindustrializati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1997, 97 (42): 1-12.
- [23] CAPRON H, DEBANDE O. The role of the manufacturing b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and public services [J]. Regional studies, 1997, 31 (7): 681-693.
- [24] DOUSSARD M, PECK J, THEODORE N. After deindustrialization: uneven growth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in “postindustrial” Chicago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85 (2): 183-207.
- [25] HERSH A, WELLER C. Does manufacturing matter? [J]. Challenge, 2003, 46 (2): 59-79.
- [26] 赵儒煜,阎国来,关越佳. 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欧洲主要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J]. 当代经济研究, 2015 (4): 53-59.

- [27] LEE D, LIM H.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risis: stability is not resilie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19, 24 (1): 212-226.
- [28] PIEPER U. De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nexu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ment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36 (4): 66-99.
- [29] SINGH A. The causes of fast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 [J]. *UNCTAD Review*, 1995: 91-127.
- [30] RAVNDRAN R, BABU M.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 [M]. *UNU-WIDER*, 2021.
- [31] CRUZ M. Premature de-industrialisation: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the Mexican case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5, 39 (1): 113-137.
- [32] VAN NEUSS L. Globalization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advanced countries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18, 45: 49-63.
- [33] BAMBER D J.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J].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1980, 31 (1): 83-84.
- [34] ROWTHORN R, RAMASWAMY R. Growth, trade,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J]. *IMF Staff papers*, 1999, 46 (1): 18-41.
- [35] KRUGMAN P R, LAWRENCE R Z. Trade, jobs and wages [J]. *Scientific American*, 1994, 270 (4): 44-49.
- [36] ALMON M J, TANG J M. Industrial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post-2000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slowdown: a Canada-U. S. comparison [J].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monitor*, 2011, 22: 44-81.
- [37] GREEN G P, SANCHEZ L. Does manufacturing still matter? [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7, 26 (5): 529-551.
- [38] KOLLMEYER C. Explaining deindustrialization: how affluence,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globalization diminish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9, 114 (6): 1644-1674.
- [39] AUTOR D H, DORN D, HANSON G H.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 (6): 2121-2168.
- [40] VAN DER PLOEG F. Natural resources: curse or bless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49 (2): 366-420.
- [41] PALLEY T I. The theory of global imbalances: mainstream economics vs structural Keynesianism [J]. *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 2015, 3 (1): 45-62.
- [42] 叶振宇. 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探究与应对策略 [J]. *中国软科学*, 2021 (5): 12-25.
- [43] TREGENNA F. Deindustrialis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EB/OL]. (2015-01-01) [2023-08-26]. <https://cris.maastrichtuniversity.nl/en/publications/deindustrialisation-structural-change-and-sustainable-economic-gr>.
- [44] KANG S J, LEE 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e-industrialisation [J]. *The world economy*, 2011, 34 (2): 313-329.
- [45] 乔晓楠, 杨成林. 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与经济绩效: 一个分类比较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 (6): 5-17.

The Types, Causes, and China's Response to "Deindustrialization"

Nian Meng, Li Minxing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struggling in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mid-to-late industrialization to high-quality industrialization, yet there has been a phenomenon of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This phenomenon has sparked concerns among scholars about whether China will fall into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its potential negative impacts 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ecurity.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and type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ir impact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a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source of innovation, the foundation of a strong country, and the ballast for national economic health. Consequently, it argues against the blind pursuit of a service-orien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promote China's transformation from a big manufacturing country to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the article proposes a series of feasible measures, including enhanc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reducing production costs, optimizing spatial layout, and integrating with advanced service industries

Keywords: typical deindustrialization;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reindustrialization

(收稿日期: 2023-09-17; 责任编辑: 沈秀)